

农民日报·中国农村网记者 陈艺娇

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2.5小时。短视频已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在城乡“数字鸿沟”不断缩小的今天,农村留守儿童对短视频的接触量、接触面也在大幅上升。在“小屏幕”的世界里,这些缺少父母监督和关怀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形成对短视频的依赖,进而陷入沉迷短视频的困境之中。

何秋红是河海大学的一名教授,一直关注媒体与儿童社会问题的她每次回农村老家都能接触到不少留守儿童。最近几年,她发现留守村里的孩子被手机短视频吸引的现象越来越多,“我在南京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小学中学,但这些孩子对手机并没有留守儿童那么沉迷。”两相对比,她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她看来,短视频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不容小觑,长期紧盯屏幕导致的视力下降、身体素质变差;分散他们的时间精力,进而影响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短视频对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也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短视频“短、新、快”的特征,儿童习惯于碎片化认知,长期专注力受到破坏,难以静下心来听父母老师的劝导,也不再满足于现实世界中“朋友”的陪伴,只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到了今年暑期,何秋红组织学生成立了“留守儿童短视频接触现状研究”暑期实践项目,团队成员深入安徽、江苏、河北、河南的不同区县展开调查,试图探讨留守儿童沉迷短视频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我让学生们深描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现状,了解留守儿童为何使用手机,使用手机干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也指导学生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和他们一起探索具体的方法,如何提高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让他们发挥手机的正向功能。”何秋红说。

另一种“陪伴”

团队成员刘馨泽还记得,她的调研始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村子里的一个托管班。班上的老师告诉她,托管班里有5个孩子是长期寄宿的,基本都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家鸿便是其中一个。

家鸿今年11岁,妈妈在他一岁半时离家出走,爸爸常年在外工作,从记事起,家鸿的大半时间都在托管班度过。

8岁时,家鸿开始接触短视频,“最开始看是因为我爸爸、表姐、姑姑他们都看,然后我也跟着看,看着看着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但是刷视频刷得正在兴头上时,就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他这样描述自己黑白颠倒的假期,前一天熬夜打游戏,早上睡到11点;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开始刷抖音,等再看时间时都已经晚上六点了,“我还以为才下午两三点呢。”

对于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短视频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带着这个问题,团队成员蒋成轩来到了河南省睢县郭营村,村里一对姐妹的经历似乎让她有了答案。

姐姐马思琪上五年级,妹妹马梦瑶上三年级,两人平时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不同的是,姐姐喜欢刷“快手”,妹妹习惯看的是“小红书”。两人看的内容也不一样,妹妹喜欢看动画片解说类,经常刷到的动画片是“斗罗大陆”;而姐姐的快手里最多的是搞笑剧类的视频。

在大数据算法的支持下,姐妹俩收到的视频内容总是能精准地“投其所好”。在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之后,蒋成轩了解到,短视频平台记录并追踪儿童观看短视频的时间、频率、内容偏好等,并通过算法推荐,根据用户标签、兴趣点、位置、相似用户偏好等数据来进行算法匹配。以“抖音”“快手”“小红书”“西瓜视频”等软件为例,大部分低龄儿童会刷到动画片、游戏解说等视频,而年龄稍大的软件里则会充斥着短剧、音乐、娱乐新闻等内容。

“短视频的内容有趣,娱乐性强,在几秒内就能抓住人的注意力。再加上智能算法的助力与便捷的下滑页面,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时候完全不用深度思考,很轻松便能收获快乐,让大脑得到多巴胺的奖赏。”她说。

在走访中,团队成员接触到了大量性格各异、经历复杂的留守儿童。他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沉迷短视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缺少陪伴是这些孩子的共性。除了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外,短视频媒介的交互性正好迎合了他们陪伴需求的缺口,形成了一种对短视频媒介的“黏性”。

在刘馨泽的印象中,初二女生萍萍是个富有个性的存在。父母离异,性格内向的萍萍跟着妈妈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老小区里。走进她的房间,满满当当摆满了动漫周边,墙上贴着的歌手海报、专辑宣传画勾勒出一个“二次元少女”的生活日常。萍萍也经常以“宅”“游戏少女”作为自己的标签。

打开她的抖音软件,聊天小窗口经常有几十条未读消息,“我经常和我朋友分享小视频,然后就在评论区评论对方分享的小视频。我们会一个个看完再点评。”她笑着说,“像古代皇帝批奏折那样的,我们就建了个群叫‘奏章批阅小组’。”

谈话间,萍萍说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刷视频,她其实都不是一个人。出去时,朋友会为实体陪伴在她身边,而在家刷视频时,朋友也会在线上与她同频共振。这是她想要的陪伴,用她的话说,就是“存在感和被看见的安全感”。

通过和萍萍的接触,刘馨泽感到,缺失的陪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情感缺口。“留守儿童因为长时间无法与父母亲在一起,往往处于一种落单的状态。而短视频软件里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和互动行为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失,长此以往,缺乏监督与引导的他们,便很容易陷入短视频的漩涡,沉迷于手机里的虚拟世界,忽略了学习和生活中更值得关注的事物。”她说。

未成熟的“三观”

与留守儿童交流,对于这些第一次参与复杂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留守儿童“小屏幕”之困

随着调研的深入,何秋红发现,学生们走访的一些实际情况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有的会不理你,无视你的问题。还有的可能会回答得比较敷衍,所说内容的价值观不太正向。”蒋成轩说,每次遇到这样的谈话对象,她不由得就会有头疼。

李鹏宇和李思宇兄弟俩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调研报告中,蒋成轩记录了她与两人很多略显“尴尬”的对话。“为什么不爱学习”“费脑子”“会看一些学习的视频吗”“我得了一种病,只要一看书就会过敏”……

在家里,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平时,李鹏宇喜欢刷“快手”里边王者荣耀游戏的讲解视频,李思宇则喜欢看“西瓜视频”里的恐怖故事。

而在学校里,兄弟俩经常会说一些网络流行梗,比如“芭比Q了”“彻底疯狂”“那年我双手插兜”,他们告诉蒋成轩,这些都是从短视频里学着的。“我是不知不觉就说了出来,虽然不想说,但是说话总蹦出来,说到半路才想起来,我咋说出这句话了。”李鹏宇说。李思宇则说自己“从一年级开始就会骂人了”。

面对在网络热梗面前笑得“前仰后合”的两个男孩,蒋成轩真切感受到网络短视频对低龄儿童产生的影响,“对于一些低龄的留守儿童,很容易就对视频内容进行学习和模仿。”她说,“他们过早地接触到了大人的社会,见识到的东西多了,辨别能力却跟不上。面对各种信息不知如何筛选,更不知道如何拒绝成人世界中某些观念和言行。”

谈及这类“小大人”类型的孩子,蒋成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明玉,一个六年级的女生。之所以感到她的“成熟”,不是因为穿衣打扮,而是那种由内透露出来的淡定和波澜不惊。“她说,这么多留守儿童里,明玉是唯一一个询问了她来访问目的孩子。

明玉喜欢文科,经常在“快手”上看一些历史科普类的视频。有一次,她刷到一则“清华大学卖中药给日本”的短视频,视频里说,“清华大学现在与日本合作,将我们中药卖给了日本,导致中药涨价,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生也出了国,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明玉一直信以为真,在访谈时,还当新闻告诉蒋成轩。

“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二元对立的、很幼稚的低质视频,”蒋成轩说,“这种视频为博流量断章取义,毫无下限,被辨别能力尚不完善的儿童刷到,对他们认知世界、塑造三观百害而无一利。”

在研究团队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被虚假信息误导的现象并不鲜见,“短视频里良莠不齐的信息不仅会对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更会影响他们尚未成熟的认知和观念。”团队成员唐思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唐思瑶的调研对象李欣是一名刚步入高三的女生,家住安徽省太湖县。在乡下奶奶家二楼的客厅里,她见到了这个略显拘谨的女生。

平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李欣会刷短视频当做放松解闷的方式。她喜欢用“抖音”看一些博主拍摄的短剧。有一次,她刷到一条某博主拍摄的家庭短剧,大意是将夫妻俩的角色互换,反讽丈夫对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的付出视而不见。李欣觉得有意思,就随手点了个赞。后来,她就经常刷到相似博主拍摄的短剧,题材也是有关两性关系的话题。“他们的视频好像一条不落,抖音太会推荐了。”她说。

在谈话间,李欣说自己喜欢看“大女主”类型的视频,喜欢里边“清醒”“不恋爱脑”的价值输出。“那有没有谈恋爱或者喜欢的人呢?”面对这个17岁的女生,唐思瑶想试探又充满好奇。

“那些男生有什么好的,幼稚又无聊。”李欣撇撇嘴,眼神透过二楼的窗户,在盛夏绿油油的稻田里游移。

一把双刃剑

随着调研的深入,何秋红发现,学生们走访的一



刘馨泽与受访对象谈话。

些实际情况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不仅作为接受者用手机看视频,还喜欢自己拍短视频,而且把这种方式当做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工具。”她说,“这是调研之前没有想到的。”

在郭营村,蒋成轩的另一名走访对象李萌萌是一名六年级的女生,也是一个在“快手”上拥有2000多粉丝的博主。“我不算多的,在我们学校还有几万粉丝的。”李萌萌告诉她,“她们走的是颜值路线。”没有大多数留守儿童的腼腆和害羞,李萌萌热情又开朗的个性让蒋成轩印象深刻,和弟弟互呛、偶尔骂几句脏话,爷爷出门打麻将时会自己做饭。

谈到发视频的事儿,李萌萌话更多了,“我喜欢鞠婧祎嘛,想让人多知道知道她。”她说,从五年级开始,她定期发有关鞠婧祎的视频,因为其中一个视频火了,播放量达到几万次,从那开始,就有很多鞠婧祎的粉丝开始关注她。逐渐积累上升的关注度让她兴奋,在她主页的一个视频里,AI配音了这样一段话:“确定不来我的列表吗,我的列表随时欢迎,来者不拒,待人不差……”

蒋成轩对这个作品印象很深,因为她感觉视频里的李萌萌“语气和口吻中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六年级女生的话”。

在团队调研报告里,这类视频博主低龄化趋势的例子不止一个。王雨婷的调研对象刘畅是一名二年级的女生,而打开她的抖音主页,790+的作品数量让王雨婷“吓了一跳”。刘畅的奶奶说,她学会自己拍抖音了之后,就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每天都要拍抖音,拍的各种各样的。从跟着视频里的音乐节奏跳舞到夸张的影视、动漫人物特效;从跟着视频里自带的台词“演戏”到特效夸张的长腿妹妹,而且每个视频都带着厚厚的美颜滤镜。

“传统观念里,8岁应该是一个自由烂漫、爱玩爱笑的年纪,如今的美颜特效似乎有某种‘魔力’,会让人迷失在其中。”王雨婷想到,留守儿童在美颜特效的“美丽”中获得自信,逐渐愿意展示自我,这是件好事,但长此以往,也容易产生不真实感。“在这种大环境下,儿童与成人的界限也正在被模糊,催生出过早成熟的现象,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她说。尽管弊端不小,但研究团队也捕捉到了这种方式对于留守儿童影响正向的一面。

他们在一些家庭的走访中发现,创作短视频的

过程能够释放孩子旺盛的表达欲和表现欲,“特别是拍的视频在发出去后获得了点赞,有些孩子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虚拟社交关系,获得社交的满足感。”王雨婷说。而另一个留守儿童小卡的故事,也说明了短视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具,用来维系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小卡是刘馨泽在福州调研时遇到的一个13岁的女孩,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她爸爸妈妈生下她几个月就到深圳去了,这丫头就一直跟着我们住。夫妻两个每个月就寄些钱回来,问问丫头的情况。”小卡爷爷说。

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小卡印象深刻的事情。学校举办成长仪式,班上的一位家长上台分享孩子的成长历程。那位妈妈拿出一本成长相册,有孩子刚出生的照片、学会走路的照片、做手工的照片、学跳舞的照片……每一张都有妈妈和孩子的手工装束以及小小的留言框。看着那位母亲双眼微带泪花地讲述这些温馨的亲子时光,小卡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后来,爸爸给她买了手机。从那时起,她便开始尝试用拍照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在和爸妈组建的家庭微信群里。后来她又接触到了短视频,便开始学着拍摄一些日常主题的视频,甚至在镜头面前唱起了歌曲,在学校里有了自己的“粉丝”。

“小卡说,拍这些视频也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日常,她也有自己的小私心,希望能让远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妈妈平常有机会看到她慢慢长大的样子。”刘馨泽发现,小卡的抖音账号的聊天对话框里有一个小群,群名是小卡的爸爸取的,叫“阿卡的家庭粉丝团”。在述说这些细节的时候,这个女孩有些微微发红的眼睛,是这次调研活动里,让刘馨泽感到格外温馨的事情。

兴趣是良药

在调研的尾声,何秋红作为指导老师撰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报告,文章里她这样回应自己关注这个问题的初衷:“若干年后,这一代留守儿童回忆起童年,不再有‘池塘边的榕树上’这样仿佛加了滤镜般的美好瞬间,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可能只有一部被摔碎的、卡顿的旧手机。”

因此她认为,如何帮助留守儿童提高媒介素养是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而团队成员也在大量的

走访实践中慢慢找到了一些答案。

黄筱舒接触的一名高三女生裴莹平时在寄宿制学校上学。除了寒暑假,学校只有每两周放一个下午的短暂假期。这也是她能够接触手机和短视频的时间。

裴莹喜爱音乐,最爱看的一部综艺节目是由湖南卫视出品的《声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档节目,她喜欢上了音乐剧。虽然假日短暂,她没有足够的时间看完所有的集数,但在抖音上,她可以看到综艺的精彩片段。“现在的高中生活是很辛苦,但是抖音让我看到很多有趣的新奇的东西,比如旅游景点、演唱会等,还有我喜欢的音乐会,我想在毕业后去看看这些。”她说。

对于裴莹来说,抖音成为了她看向世界的窗口。她说,小县城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抖音帮助她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与美丽,让她了解到了好听的音乐剧,偶尔的放假偶尔的娱乐在这样辛苦的生活之中显得格外的甜蜜,这是抖音为她带来的快乐。

“关心和陪伴的缺席会使留守儿童的心理产生空虚感,他们因此去寻找新的情感代偿。短视频出现之前这个代偿或许是抽烟、早恋、打架,短视频之后或许还会是别的东西。”何秋红说,“因此,我们不必将短视频视为洪水猛兽,而要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裴莹的例子让研究团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让一个孩子沉迷手机一整天无法自拔,也可以让她专注于做好一件事而不知疲倦。而且,这种力量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拉力,而是来自孩子内心的驱动力,这种内驱力可能比任何严苛的管教方式都更加管用。”黄筱舒说。

虽然,为留守儿童解决“小屏幕”问题之路仍然困难重重,但何秋红相信,在家庭、学校的协同努力之下,短视频会给留守儿童带来更多正面的效应。而近几年,一些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她对于解决问题看到了更多希望。

2023年3月,黄冈市罗田县三里畈镇启动了“希望家园”项目,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希望家园”项目依托闲置的中小学等地建设书屋、教室等设施,通过吸纳大学生志愿者、本地返乡大学生、当地退休教师等群体加入,帮助学校以及留守儿童家庭解决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困在手机里”的问题。“我觉得,在可实现条件下,也许可以探索农家书屋的模式,并引入志愿者引导。放学后或者放假,留守儿童可以在书屋写作业,同龄人一起进行现实的游戏与陪伴,志愿者能推荐高质量的视频节目给孩子们,应该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留守儿童沉迷手机。”何秋红说。

(团队成员:黄筱舒、王文洁、刘馨泽、蒋成轩、唐思瑶、邓睿婕、王雨婷)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留守儿童均为化名,为保护未成年人,图片部分区域已经过特殊处理)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